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（十一）

李致忠

《周礼》十二卷 汉郑玄注 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（劳健抄补并跋）。每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不等，注文小字双行，行三十五六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经》，是儒家经典之一。全书共有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司空》等六篇。《冬官司空》早佚，汉时以《考工记》补之。《天官冢宰》记邦治之官六十三职，其职统摄六官，以吏治为专职，兼掌宫中事务；《地官司徒》记邦教之官七十八职，其职以教化为务，凡地方组织、均土分民、征赋等均在其掌；《春官宗伯》记邦礼之官六十九职，凡礼、乐、卜祝、文史、星历、车旗之属均领之；《夏官司马》记邦治之官七十职，其职专掌军事与封建，兼乃王之车旗、弓矢、护卫等；《秋官司寇》记邦禁之官六十六职，其职主刑法、狱讼、刑禁，兼及盟约、宪令、辟除、外交等；《冬官司空》久佚，汉朝人补以《考工记》，称《冬官考工记》，记诸工事制作，并详其尺度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谓：“先儒固有疑于是书者，若林存孝，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渎乱不经之书，作《十论》、《七难》以排弃之。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甚者或谓刘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。”通俗地说，就是古文经学家认

为此书为周公所作，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出于战国。西汉末年，刘向、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，他们于秘阁中发现了此书，于是加以整理，使《周官》复显于世。因而有人怀疑秘阁中根本没有此书，而是刘歆伪造，以佐王莽作乱的。“惟郑康成博览，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故其学遂行于世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）其实这些说法，均未免偏颇。近人参以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，证以该书中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，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，是比较符合事实的。实际上，《周官》是一部蒐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，寓以儒家政治理想，经过增损排比汇编而成的职官专书。是研究先秦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礼法诸制的重要参考书。

郑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（今属山东）人。生于东汉顺帝刘保永建二年（127），卒于东汉献帝刘协建安五年（200），享年七十三岁。曾入太学学今文《易》和公羊学，又从张恭祖学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等。最后从扶风马融学古文经。玄游学归里，聚徒讲学，弟子众至数百千人。后因党锢被禁，则潜心著述。以古文经说为主，兼采今文经说，遍注群经，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，世称“郑学”。郑玄尝注《易》、《书》，笺《毛诗》，注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于《春秋左氏传》亦尝动笔笺注，后路遇河南荥阳服虔字子慎者，亦当时经学家。问其所学及谈论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深觉与己见颇类，于是将自己所注《春秋左氏传》稿送给服虔，属其笺注。故《春秋左氏传》古注，服虔是一家。唐孔颖达受命作《五经正义》，于《左传》则取晋杜预笺注，服虔注从此隐而不显矣。可见郑玄的确是遍注群经，是汉代的经学大家。故后世谓读经而不由郑学，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。足见郑注乃读经之凭借，通经之津梁。惜郑注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早已亡佚。付服子慎所注《春秋左氏传》亦亡。传世者仅《诗》笺及

《三礼》注耳。本文所评介之宋婺州唐宅刻本《周礼》，是郑注传世者之一。且经注合刻，只有郑注，而不加释音、互注，其珍贵不言而喻。

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《周礼》郑注，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。一部完帙，旧为汪喜孙收藏，后经杨氏海源阁，再经周叔弢自庄严堪，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一部仅存前六卷，原为章硕卿旧藏，后经徐梧生，再经袁寒云，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

完整的那一部，有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劳健写的跋文。曰：“海源阁杨氏藏宋本四经四史，因以名斋，此其一也。四经之《毛诗》，固残缺不全。《仪礼》亦实非宋刻。惟《礼记》与此本允称鸿宝。《礼记》尚有张氏摹刻盛行于世，此则郑氏单注完帙仅传，且为黄、顾诸老所未见，真希世秘笈矣。叔弢近年所收杨氏宋本甲观，子集部则有《陶□》、《王摩诘》；子部则有《庄子》、《庄子全解》、《新序》；史部则有《晋书》，今更冠以此经，四部菁华萃于一室，何啻王侯宜其不恤为之举债而偿重价也。此本旧传北宋刻，然书中慎字固缺笔。各页字体刀法间，微有刚柔方圆之异，或北宋刻南宋补耶？第八卷末有阙佚，原装附画栏空纸三页，叔弢属为据文禄堂新印影宋建本补完。约略依本书行款字数写之，适满一页。卷尾应著‘周礼卷第八’一行。本书是否别作一页，或有经注字数，有木记，皆不可知，姑从阙佚。今夏，文禄堂影印宋建本《周礼》，庾楼作跋，尝属余代写。庾楼跋中方致叹海源阁婺本全帙今不知谁属，岂意即在眼前，相隔不过三月，余竟获亲见，且为抄补旧阙，眼福墨缘，快幸何如！甲戌中秋桐乡劳健荐文识于唐山。”

劳健这篇跋文，将周叔弢自庄严堪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精品，作了简单交待。今又得《周礼》此本，乃杨氏四经四史斋中瑰宝，那就更加珍贵了。山东聊城杨氏藏书极富，其中最好的则辟四经四室之斋以贮之。桐乡陆敬安《冷庐杂识》谓：“聊城杨

侍郎得宋板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颜其室曰‘四经四史之斋。’”其实陆氏说得并不确切，杨氏四经四史斋所藏四经，并不包括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，而是宋刻郑注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四经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虽亦为宋刻，但因其并非郑玄所注，故又别室储之。这四经中，宋刻郑笺《毛诗》因遭兵燹而残缺不全；《仪礼》又实非宋刻；故只剩下《礼记》与《周礼》，非但是宋刻，而且是郑注，并且还是完帙，所以被劳健“允称鸿宝”。

此本《周礼》为宋代婺州市门巷唐宅所刻，以书中镌有牌记可证，无庸置疑。然唐宅究于宋代何时刊印此书，后世诸公便有种种推论了。

劳健跋谓：“此本旧传北宋刻，然书中慎字固缺笔。各页字体刀法间，微有刚柔方圆之异，或北宋刻南宋补耶？”

杨守敬跋谓：“右宋槧本《周礼》，存天官、地官、春官六卷。夏官、秋官、冬官，以附释音本补之。不附释音者避敬、殷、贞、徵、玄、匡、竟、桓、壤等讳。第三卷后有‘婺州市门巷唐宅刊’木记。大题在下，与唐石经合。第一卷末题经、注字数。审其款式字体，雕印当在北宋末南宋初。”

李盛铎跋谓：“是书当为北宋刊板，南宋修补。以书中有不避桓字者，有桓字末笔缺，系后来挖去者，实为刊板在宣和前之确证。杨惺吾所校经注，颇为精细。至谓刊在北宋末南宋初，固未审也。后六卷配入之本，避慎字讳，则南宋板刻无庸置喙矣。”

上述三家关于此书版刻的鉴定意见并不一致。劳健代自庄严堪主人周叔弢提出来的鉴定意见，是北宋刻南宋修补本。理由是书中慎字缺笔避讳，及各版字体刀法微有刚柔方圆之异。

杨守敬的鉴定意见是北宋末或南宋初刻本，理由是书中敬、

竟、玄、讓、殷、徵、貞 匡、桓等字缺筆避諱。其中特別是桓字缺筆避諱，便構成楊氏定此本為北宋末或南宋初刻本的主要根據。因為欽宗趙桓是北宋末帝，在位不過一個年頭。避他的名諱，當然不是北宋末即南宋初。

李盛鐸據書中桓字末筆有缺有不缺的現象，做出了另一種解釋。他認為書中桓字有不缺筆回避者，這是固有的真實現象；有缺筆者，則是後人有意挖去的。所以他肯定此本刻在北宋宣和年間之前。並批評楊守敬說雕印當在北宋末或南宋初是不正確的。上述三家各執一端，各有各的意見，但都不敢輕信。

李盛鐸謂桓字不缺末筆，是刊板在宣和之前的確證；缺末筆者，則是後來挖去者，這就令人不解了。這後來挖去桓字末筆者，是出於什麼目的呢？是補版重印時再避欽宗名諱而挖去末筆，還是後世書賈作偽而挖去末筆呢？補版重印時再避已故皇帝廟諱，無前例可尋。後世書賈作偽而使書籍版刻時代後移，亦無前例可尋。因為這是傻事，要失本的。所以李盛鐸的說法難能自圓其說，亦無法令人理解。

勞健的意見是北宋刻南宋修補，實際上與李盛鐸的意見沒有本質的區別。楊守敬定為北宋末或南宋初，實則沒定。

一九五九年出版的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，關於此書的版刻，趙萬里先生有如下的議論：“宋諱缺筆至桓、完字。刻工沈亨、余竑又刻《廣韻》。《廣韻》缺筆至構、慎字，因推知此書是南宋初期刻本。卷三後有‘婺州市門巷唐宅刊’牌記。卷四、十二後有‘婺州唐奉議宅’牌記。唐奉議疑即唐仲友。仲友以校刻《荀子》等書遭朱熹彈劾而得名。”趙先生這段議論，實際上是从三方面論證此書系南宋初期刻本。第一個理由是此書避諱至桓、完字止，這是南宋初期回避北宋末帝趙桓名諱的常見現象。第二個理由是《周禮》刻工中的沈亨、余竑，還曾參與刊刻《廣韻》。而《廣韻》中避諱至構、慎字止，亦是南宋初期的事。三是唐仲

友为婺之名门，且以校刻《荀子》等书遭到朱熹的弹劾而罢官。足见唐仲友家是有刻书传统的。这三条理由论证凿凿，实获我心。

此书避讳不十分严谨，这是南宋坊肆、私宅刻书常有的现象。玄眩字缺笔，避的是赵宋远祖玄朗之讳，但弦字又不缺笔。徵、殷、敬、竟、贞、匡、恒、让等字缺笔，避的是赵匡胤祖、父，及历朝皇帝的庙讳。桓、完缺笔，避的是北宋末帝钦宗赵桓的名讳。慎字缺笔，则回避的是南宋第二帝皇帝赵昚的名讳。南宋高宗之后，儒家经典行不避之例，已见诸记载。但宋讳之严，从北宋已形成习惯。故至南宋刻书，于北宋诸帝庙讳也还是常常回避。但又不甚严格，这就出现了有避有不避的现象。南宋前期的书刻中，有一特殊现象不知何故，即于北宋诸帝庙讳回避均已不严，惟独对待曾经被金人俘虏而仅做年把皇帝的赵桓，则格外垂青，遇之则讳。这也许是古人同情落难皇帝的感情所致。因此，在宋版书中，对待赵桓的名讳要慎重运用。不能一见到书中有回避赵桓名讳的现象，就断定其为北宋刻本。此本《周礼》亦不例外。

此书刻工有王珍、沈亨、余竑、徐林、李才、卓宥、高三诸人。其中沈亨、余竑又曾在南宋孝宗时参与刊刻《广韵》一书。因知沈亨、余竑是南宋初期婺州一带的刻字工人。南宋建炎之初至淳熙之末，已有六十余年。这二人既然在孝宗时还在从事刻书，大概他们出生之时宋朝就早已南渡了。出生已在南宋的刻工，而出自他们之手所镌刻的《周礼》，怎么可能会是北宋刻本呢！且书中慎字亦已缺笔避讳。故此书之刻很可能亦在南宋孝宗之时。

考“唐仲友，字与政。父尧封，为侍御史，以直言称仕□，直龙图阁朝散大夫。仲友博涉群书，登绍兴进士，复中宏词科。累官判建康府。论时政，上纳其言。再转知台州。兴利除害，政

声哗然。俄为同官高文虎所忌，谮于提举刑狱，劾罢。主管建宁武夷山冲道观。开席授徒，学者云集。仲友史学精绝，尤邃于诸经。下至天文地理、王霸兵农、礼乐刑政、阴阳度数、郊庙学校、井野畿疆，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，其故精粗本末，兼该并举。与吕子同居于婺，而独尚经制之学。然天性廉直，与物多忤，仕未通显，托之于论述而终。”（康熙《金华府志》卷十六）

唐仲友的父亲是唐尧封，南宋绍兴间进士，又中师儒选。累官侍御史、吏部侍郎、国子祭酒、直龙图阁朝散大夫。唐仲友是绍兴辛未（二十一年1151）赵逵榜进士；其兄唐仲温，字分直，绍兴甲戌（二十四1154）张孝祥榜进士，任饶州教授；其兄唐仲义，字与信，绍兴庚辰（三十年1160）梁克家榜进士，尝任通判。他们父子四人，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的三十一年中（1131—1161），先后登第，可谓婺之名门。所以牌记只称“婺市门巷唐宅刊”、“婺州唐奉议宅”，这在当时恐怕是远近皆知的门庭，故只是简称，无须细表了。婺州即今之浙江金华。遍查万历《金华府志》、康熙《金华府志》、康熙《金华县志》、道光《金华县志》，婺之郡治，前没有这样一个唐姓望族，后亦没有这样一个唐姓名门，唯有唐仲友父兄，发迹于绍兴年间，成了婺州城里的唐姓大家。这唐奉议究竟指谁，无翔实材料可考，但更大的可能是指唐尧封。“尧封累官俱有谗言执奏。为御史劾王之望、钱端礼骤进，可谓不避权贵。及言不从，辄弃官归，可谓进退合义。郑忠愍公尝举以己代。家居贫甚，卒之日至无以为葬。王鲁斋称其清德劲操为吾乡之典刑。吁其贤矣。”（康熙《金华府志》卷十六）从婺州唐氏这父子四人看，似以唐尧封做官最高，唐仲友声名最显。唐奉议，很可能是唐尧封做过的官职，故唐仲友刻书时便仍以唐奉议称其宅名。加之唐仲友又确实邃于诸经，独尚经制之学。又有刻书爱好，且因校刻《荀子》等书而遭朱熹

弹劾。综合所有这些理由，说婺州本《周礼》是唐仲友家所刻，可能性是极大的。如果确是他所刻，则时代亦当在孝宗之时了。康熙《金华府志》说唐仲友“与吕子同居于婺，而独尚经制之学。”这里的吕子，当指婺州吕祖谦。吕祖谦，字伯恭，以哲学、文学而知名。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和朱熹、张栻齐名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吕祖谦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享年四十四岁。他整个生活的时代，也正是南宋绍兴至淳熙年（1137—1181）之间。而与他同居于婺的唐仲友，以五十三岁卒于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。从此前推五十三年，则是绍兴五年（1135），他刚刚出生。吕祖谦比他小两岁，而又早卒七年。所以唐仲友的主要活动时间也在南宋绍兴至淳熙间。这也是《周礼》刻于孝宗时的佐证。

且考康熙《金华府志》卷二，记载康熙时金华县治尚有石板巷、芝麻山巷、柴场巷、螺蛳巷、麻糍巷、斯家巷、庄家巷、赵麻巷、石子巷、小仓巷、酒坊巷、麴务巷、戚家巷、曹家巷、壮城巷、八角库巷、跃龙巷、皂坊巷、上衢巷等街巷名称，表明婺州郡治的街道自来有称巷的传统。由此上推至宋，唐宅所居的“市门巷”，很可能指的是某市场门脸附近的街巷名称。所以此书版本似可著录为“南宋初婺州市门巷唐奉议宅刻本”。

元荆谿岳浚校刻《九经》之后，写了一部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》，记载他在校刻《九经》过程中，曾经用过西京石经本、晋天福铜版本、蜀大字本、蜀学重刊大字本、中字本、中字有句读附音本、潭州本、抚州旧本、建大字本、俞韶卿家本、中字本凡四本、婺州旧本、兴国于氏本、建余仁仲本等若干本参校。其中所说的“婺州旧本”，指的大概就是这个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。此本中字秀雅，刀法剔透，皮纸印造，墨色匀净，一看便知是宋时浙刻风貌。且此本“与严（州）、抚（州）两刻同为郑注专本，首尾完具，镂锲精工，亦无弗同。而经注之胜各本者，证

之彭文勤公《石经考文提要》、阮文达公《周礼校勘记》，及复翁《札记》、简庄跋文，尤多脗合。如倦翁云：‘秋官司寤氏掌夜时。注，夜时谓夜晚早，若今甲乙至戌。疏，又以甲乙则早时，戌亥则晚时。实其说，惟蜀本作戌字。’窃谓戌字为是，疏则传写之误而曲为之说尔。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戌夜也。是戌字之沿讹已久。故今据校之宋本，从无云作戌者，而此本独未误。又倦翁云：‘开元所书《五经》，往往以俗字易旧文。五季而后镂版传印，经籍之传虽广，而点画义训讹舛自若。盖宋时刊书，多出坊贾，俗文破体，大抵类然。’此本字学独极精审，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，不使分毫差误。故宋讳之缺避，较他本颇详。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，即宋槧各本亦莫与之京矣。不更瑤中之瑤耶！”（《楹书隅录》卷一）这是杨氏海源阁对此本的评论。

“宋槧本《周礼》……今在会稽章硕卿大令处。敬于光绪丙戌冬十二月赴硕卿嘉鱼县署，出示此本，余惊为秘籍。竭两日力，略为校之。如《天官太宰》九两注，疾病相扶，无持字。八成注，贷子，不作贷予。膳夫注，稍子谓非日中，谓不作为。腊人注，各本固疏衍二十五字，此不衍，与嘉靖本合。《地官》遂师遂大夫不提行，以圉隔之。《地官》载师注，其大夫，不作上大夫，下大夫。媒氏注，行若，不作行沽。遂师抱磨，不作磨。遂大夫注，鎡其不作鎡基。稻人芟夷，不作羹山。虞柔刃不作忍。槁人注，不与鰾人言者，言其共至尊，各本脱‘者言’二字，岳本、嘉靖本遂改其为者而共至尊。遂若不相接。又潘澜蔑餘，蔑字偏右，据释蔑，一本作残，原刻必是残字挖去歹旁。今各本无作残者，足见此本根源之古。《春官》世妇注，亦用士人，不作八人。司于注，谓盾，不作楯。大宗伯注，五年而再殷祭，五上无率字。群神之兆，不作群臣。肆师注，匪以致饗，匪字上空，原刻省是筐字，以经用古字，注用今字，例之则筐字

是。司尊彝注，罍臣不作罍神。说拭勺不作掬。大司乐注，鸟兽跄跄，不作鉦鉦、鎗鎗，与释文一本合。小师大予乐，不作大子乐。与《后汉书注》合。典同注，甄耀，不作甄濯。与贾疏合。诅祝注，郑司农云载辞，此本云字挤入，原刻无云字，则载为说字之误，尚有迹可寻。太史底曰不作底。或为汁，不作叶。巾车注，声且警众，不作声且。凡此，皆一字千金。其他胜今本处，不可胜纪。……此虽残本，若能并所补释音翻雕饷世，诚经学鸿宝也。”这是杨守敬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在章硕卿处见到此本《周礼》，经过两日校勘而例举出来的佳胜处。可见此本在传世《周礼》各本中，的确是个古本，而且是个善本。且海内流传一部完整，一部残存一半，今均藏北京图书馆。在《周礼》研究中，将会不断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。

《礼记》二十卷 汉郑玄注 唐陆德明释文 宋刻本翁同书跋 存十六卷（一至十六） 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三字，细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各卷首行顶格镌“礼记卷第几”；二行顶格镌“篇名第几”；又低九格镌“郑氏注”。书中避讳较严，遇应讳之字，有的不但缺末笔，以示回避，还要在讳字之上加墨色线围，以示严谨。如书中玄、县、让、徵、弘、殷、匡、筐、胤、醕、恒、崩、贞、暨、树、頊、煦、桓、椁、完、遘、慎、惇、敦等字，皆加墨围，有的还缺去末笔。音义之字皆用墨盖子白文，或称飞白文。板心上间镌字数，版心下间镌刊工姓名。通体有墨印句读与圈发。这些特点，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《周礼》十二卷全同。北京图书馆所藏8635号《周礼》十二卷，汉郑玄注，唐陆德明释文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三字，细黑口，四周双边，有耳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费念慈跋谓：“此本失序跋，无刻书年月。避宋讳极严，皆加墨围。以行款考之，当是南宋建本。”李盛铎亦跋此本，谓“音义二字用墨盖子白文。宋讳及嫌名或缺

笔，或不缺，皆加墨围。板心上间有字数，板心下间有刊工姓名。刊工为仲甫、江成、应成、李元明、蔡昇、彦通、刘丁。鱼尾下题周几或周礼几，不画一。通体有句读四声。字体极似建余仁仲本，但板式略大耳。”

这两段跋文，描述的都是宋光宗绍熙间福建刊本《周礼》的特点，却给我们提供了考察此宋本《礼记》的线索。今宋本《周礼》与宋本《礼记》均藏北京图书馆，故有条件将两书放在一起对读比较。结果发现两书在印纸、墨色、字体、刀法、行款字数、讳字标识、音释标识等，宛然一体，如出一辙。例如印纸，都是竹纸印造，且纸质比较精细。我们知道，普遍使用竹纸印书，已是南宋孝宗及其以后，即公元十二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情了。且由于闽北武夷山区盛产竹材，竹纸生产数量大，质量高，所以南宋后期福建刻书多就地取材，采用竹纸印造。因而竹纸也似乎成了福建地区的刻书特点之一。

又如字体，前者《周礼》与此本《礼记》也似出一人之手。其间架笔势均有柳字风韵。我们知道，宋代刻书有三大中心：浙江、四川和福建。而这三大中心，于字体所宗也不相同，通常说来，浙刻似欧（欧阳询），蜀刻近颜（颜真卿），闽刻仿柳（柳公权）。因而这柳字风韵也似乎成了宋代福建刻书特点之一。

又如行款字数，前者《周礼》与此本《礼记》，都是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注文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三字。表明在版式规格上，两书亦完全相同。

特别是书中的讳字及讳字方式，两书亦完全相同。首先是讳法较严，即应讳之字有时不但缺笔，而且对每个讳字还都圈印墨围。其次是两书均不讳敬、竟等字。再次是两书讳字均至惇、敦等字止。而惇“廓”、“郭”等字，两书都不回避。

再如刻工，前者《周礼》有仲甫、江成、应成、李元明、蔡昇、彦通、刘丁等。此本《礼记》虽查不出这么多刻工，但有李

元明出现，则证明两书出于同一群刻工之手。

再如两书都带句读与圈发，不但证明两书之刻同出一家，还表明两书之刻同出于福建地区。元朝岳浚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》尝谓：“监、蜀诸本皆无句读，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，开卷瞭然，于学者为便。”可见带句读圈发，也构成了宋代福建刻书的特点之一。

上述种种，已无可辩驳地表明，前者《周礼》与此本《礼记》，是同时、同地、同人刻本。前者《周礼》的版刻，经过考证，我们曾经著录为“南宋绍熙（1190—1194）福建刻本”。此本《礼记》似亦可如此著录。

此本《礼记》，避讳至惇、敦等字止，表明南宋光宗赵惇的名讳尚在回避。而光宗之后的宁宗赵扩嫌名及与嫌名有关的字，都尚未回避，按宋代讳法，因宁宗御名赵扩，故与广字有关，如带“廣”字的字，如惇、廓、郭等字，都要进行回避。可此本《礼记》卷一的“祥车曠左”、“不敢曠左”；卷三的“曠也，大师也”等句中的“曠”字，均不缺笔，亦未加墨围，表明此字未行避讳。卷三的“殷人棺槨”、“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”；卷二的“祥而廓然”，注“廓，苦郭反”等句中的槨，郭、廓等字，也是既不缺笔，亦不加印墨围，表明与“曠”相关的字也未行回避。这些情况证明，此书之刻尚未到宁宗赵扩之世。而光宗龙飞仅有五年，所用年号亦只是“绍熙”一个。因而此书之版刻确可如前者《周礼》一样，著录为“南宋绍熙（1190—1194）福建刻本”。然而由于我们知道了前者《周礼》与此本《礼记》是同时、同地、同人刻本，足见它们都是当时所刻群经之一，而并非单经单刻本。因此，这两书的版本著录，均应进一步著录为“南宋绍熙（1190—1194）福建刻群经本”。

此本有翁同书手跋，谓：“此残宋槧《礼记》经注本。第一卷至十六卷具在，独阙后四卷。以板式、帀墨及宋讳缺笔验之，

盖南宋坊刻，櫟李项笃周万卷堂物也。按《礼记》注疏本，汲古阁所刊讹舛百出，十行本、闽本、监本略胜，而鱼豕亦复不少。独惠栋所见《正义》七十卷本为最善。其经注本，则世仅传相台岳氏本、嘉靖本及《石经考文》。《提要》所据之宋大字本、宋本《九经》、南宋巾箱本、余仁仲本、刘叔刚本、至善堂《九经》本，藉见一斑。又日本人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古本、足利本外，此无可考矣。今以阮元文达《校勘记》，与此本对勘之遑遑，与惠校及各宋本合，其精审且在相台之上。而十行及闽、监、毛本无论矣。然此本实与诸宋本皆不合。如《礼器》‘诏侑武方’，注‘诏侑’或为‘韶囿’，诸宋本皆然，惟此作或为‘诏圉’，与《释文》及山井鼎所据古本、足利本合。此与海内诸宋本皆不同之证也。经籍旧本日亡日少，鉴者其毋忽诸。弊斋学人志。”

翁同书字祖庚、号药房，翁心存子，常熟人。道光时进士。咸丰中尝与洪杨军战于江北，复扬州，官至安徽巡抚。又参与剿陕甘回，死于军中，谥文勤。同书在军旅中仍孳孳学问，寒暑不辍。且恪守两汉经师家法，造次皆有依据。有《驛轩杂记》传世。此书经他收藏，且写下了上述跋文，使此本就显得更加珍贵了。翁跋中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此本“其精审在相台之上，而十行及闽、监、毛本无论矣。”这意思是说，此本在文字方面的精善已在相台本之上了，因而远在相台本之下的十行本，闽刻本、国子监本、毛氏汲古阁刻本等就不在话下了。

这里所谓的相台本，过去几百年都说是南宋岳飞的孙子岳珂所刻《九经》本，实则当是岳飞九世孙元朝岳浚所刻《九经》本。我们知道，岳飞是相州汤阴人。其九世孙岳浚虽早已徙居江苏荆溪，却仍以祖籍相州相表望。相台即指相州，或者说相台是相州之别称。相台是因相州建有铜雀台而得名。建安十五年（210）曹操在河南临漳县西南邺城西北角构建铜雀台。后魏时

于邺县立相州。东魏曾建都于此，改名司州。北周时于安阳置相州。隋朝废置，唐复名相州，改邺郡，后复为相州。宋朝仍名相州邺郡。可见相台就是相州之别称，原因就是相州建有铜雀台。因此，所谓相台本，实际指的就是相台岳浚于宜兴荆谿家塾所刻的《九经》本。

相台岳氏《九经》刻于元初，较宋代已是晚出之本，故有条件参校多种版本而出精善之本。所以后世传经之士多推相台本为经书的最好版本。翁同书跋文中所谓“其精审在相台之上”，也是将此本《礼记》与相台岳氏《九经》中的《礼记》比较之后而得出的结论。相台本已为很好的版本，此本还要在他之上，其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了。

此书铃有“项印笃周”、“浙西项氏笃周万卷堂图籍印”，表明此书曾是项笃周万卷堂的插架之物。项笃周为谁？据《藏书纪事诗·补正》谓：“《明诗综》小传，《读书敏求记校正、补镌》：冯柳东云：‘《六臣注文选》，余尝见曹倦圃侍郎藏本。……’第一卷有‘浙西项氏笃周万卷堂图籍印’。笃周，子京初名其长兄子长名笃寿。兄弟并好收藏，筑万卷堂贮之，斯时尚未有天籁阁也。”因知项笃周就是项子京。按项子京，名元汴（1525—1590），号墨林山人。嘉兴人。工绘事，精鉴赏。其所藏法书名画及古刻旧刊，极一时之盛。他的哥哥就是项笃寿（1521—1586），字子长，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历官刑部主事、兵部郎中。他们兄弟二人皆好收藏，均是当时名士。此本经项墨林收藏，且钤盖自己的藏书印鉴，则更令藏家所珍重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